

全球市场下的垄断—竞争 行业分割与收入不平等*

——以金融业和制造业为例

李 雪

提要:既有研究往往用国家权力来解释垄断行业相对于竞争行业的高收入,然而这无法解释垄断和竞争部门内部收入次序的问题,即为什么垄断行业中金融业行业收入最高,而竞争行业中制造业行业收入偏低?本研究认为,行业收入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由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来解释。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业的国家保护是我国在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时采取的改革策略,这在抑制制造业收入的同时也提升了金融业的行业收入。本文将经济全球化操作化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比较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金融业与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显著促进了金融业收入,外商直接投资则显著降低了制造业收入。对外贸易还显著降低了整个垄断行业的收入,但对竞争行业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既有研究,指出应将中国的行业收入不平等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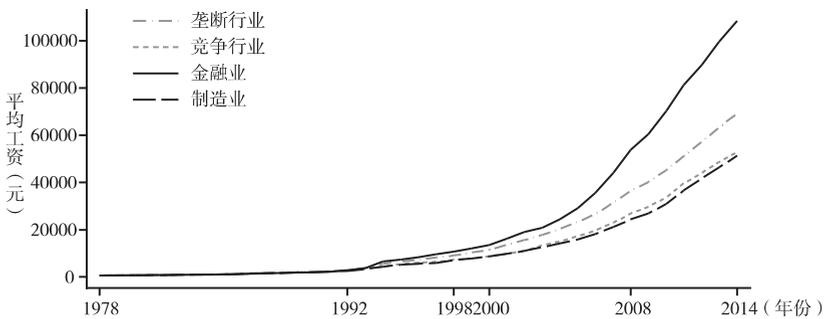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劳动力市场分割 金融业 制造业

一、引言

中国的市场转型从一开始就以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市场为特征。1980—1990年,我国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旨在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的重要工

* 本研究为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创新团队的成果。本研究曾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双周 Seminar, 2017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宣读。感谢刘欣、胡安宁、黄荣贵、田丰、吴菲、纪莺莺、范晓光、冯仕政、宋曦、李国武、赵树凯、洪岩璧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匿名专家的意见,惟文责自负。

具,出口导向型战略得以确立(袁欣,2010)。随着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全球经济显著地形塑了中国经济的行业特征和不平等结构。例如,与国际上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趋势一致,我国金融业也出现了规模迅速扩张、利润飞速增长的特征,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王水雄,2014;杨典,2018)。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借助对外开放不断壮大的“中国制造”则面临着利润下滑、资金外流的挑战,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行业利润是行业收入的来源。金融业、制造业出现的这些新特征,在收入分配上体现为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业逐渐成为挣钱最多的行业,而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其收入水平不但低于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甚至也低于餐饮、服务业等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水平。驱动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什么?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收入优势从何而来?



数据来源:按《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5汇总计算。

图1 各行业平均工资(1978-2014年)

劳动力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即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是理解中国市场转型的关键之一,也是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对于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部门,国家通过设置垄断、限制准入的方式,维持对该部门的控制,以便掌控改革方向,维持国家的影响力。研究发现,垄断行业相对于竞争行业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齐亚强、梁童心,2016)。一项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研究发现,即使竞争性行业的从业者与垄断行业的从业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个人特征,仅仅由于所处的行业性质不同,前者的收入也要显著低于后者。在解释行业间收入差异上,垄断

这一结构性因素比教育这一人力资本因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王亚柯、罗楚亮,2012;郝大海、李路路,2006)。

但是,垄断—竞争行业分割的视角难以解释行业间收入次序的重新洗牌。即为什么垄断行业中金融业的收入最高,而竞争行业中的制造业收入却偏低。亦有学者从垄断特征出发来解释金融业的高收入。然而以垄断程度论,金融业低于同为垄断行业的电力、采掘、水利等行业(张展新,2004);以其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看,很难说金融业就比能源、交通、原材料更重要,而后者一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投资的重点。还有一种解释将行业高收入归因为高生产率。然而,中国的金融业生产率不但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也显著低于国民经济中许多竞争性部门,如制造业(谢平、尹龙,2002)。

本文认为,理解金融业、制造业在行业收入格局中的位置应将其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家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做出及时应对,并体现为国家形塑市场的各种政策、法规等(如行业政策),进而对不同行业的收入产生影响。图2概括了这一过程。首先,在面临全球市场的冲击时,国家为保护某些重点行业设置了行业垄断,但对外开放扩大了竞争范围,这依然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其次,我国的制造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对外贸易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国际竞争压缩了利润空间,也对制造业员工的平均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第三,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要求国家在强化金融业垄断地位的同时,直接以国家之力帮助金融业提高效率、促进革新、降低风险,这一系列优惠政策促使金融业产生了最高的行业收入水平。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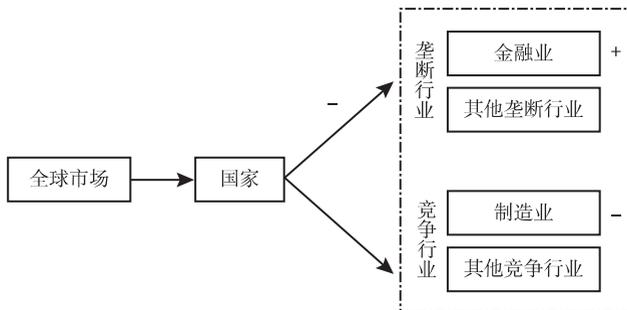


图2 全球市场、国家与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

之,在国家培育、规制市场的过程中,全球市场的挑战和机遇重新界定、改变了“国家利益”的含义,影响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对行业收入产生特定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市场转型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行业收入差距

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Nee, 1989, 1991; 1996),国家形塑市场的努力一直不曾消退,并在不同时期体现为不同形式(Bian & Logan, 1996; Rona-Tas, 1994)。在渐进式的体制改革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育程度一直因地域、所有制和行业等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Xie & Hannum, 1996; 李路路等, 2016; 王天夫、崔晓雄, 2010; 罗楚亮、李实, 2007; 吴愈晓, 2011)。

然而,这些研究缺乏对本轮经济全球化特征的考量,也较少讨论全球市场的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改革路径的。考虑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实质上是个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那么系统考察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市场转型的作用机制就显得甚为必要。正如下文即将展示的那样,当今全球市场的特征界定并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内容,从而影响了国家对金融业和制造业的行业政策,进而塑造了特定的行业收入特征。

(二)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贸易和投资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则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境进行(Lim & Tsutsui, 2012)。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为特征,这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制度基础。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产生了两大重要后果:一是制造业的全球布局;二是金融自由化潮流。以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需要将制造业保留在国内,因为依靠制造业向海外出口是平衡经常账户、控制外贸逆差的基础。而在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必须持有美元,美国经济从而必然负债运行。美国则依靠发展各种金融工具向海外融资以填补其经常账户赤字,这样就没有必要把美国制造业企业留在境内了。

金融自由化给金融资本带来巨额利益,同时也给各国经济,特别是

像我国这样的高度依靠全球市场的开放型经济体带来潜在风险。第一,在对外贸易逆差时,国内需要大笔美元。于是,国际热钱(hot money)乘虚而入,在套利后迅速退出,这进一步恶化了逆差形势,从而产生了流动性危机。第二,在贸易顺差形势下,持有大量美元的国家往往通过购买美债以维持其外汇资产的价值。当美债到期后,大量货币进入本国市场,加剧金融投机并带来巨大风险。第三,国际热钱伪装成对外贸易和FDI流入我国,这是另一个金融风险的来源。第四,几十年来累积的近1万亿FDI存量在中国预留了大量利润,一旦这些利润撤出中国,很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

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和金融业的高风险不仅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我国市场转型的外部条件。

(三) 经济全球化下的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善于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和机会为重要特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国以及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指的是我国参与全球市场和国际竞争的过程。外商直接投资(FDI)指为获得某经济体的一个企业的长期利益而进行的投资。生产的产品在出口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本土市场的需要。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以衡量它与中资企业的竞争、合作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后果。

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入了更大范围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垄断行业的收入优势。垄断行业并非没有竞争(如中国移动、电信和联通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设置准入门槛人为地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然而,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尽管是较为有限的)使垄断行业也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首先,在出口方面,垄断行业企业一般生产率较低而成本较高,出口企业只得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尽可能获得市场优势。其次,在进口方面,进口的同类产品直接对同行业的生产销售造成冲击,进而降低了员工薪酬。第三,那些有幸进入垄断行业的少量外国资本和少数合资企业,因其较高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生产率也对本行业大量的国有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进而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收入水平。

因此,本文形成下述假设。

假设1:经济全球化水平对垄断行业的行业平均收入有负影响。

假设 1a: 对外贸易水平越高, 垄断行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低。

假设 1b: 外商直接投资(FDI)水平越高, 垄断行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低。

对整个竞争行业来说,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则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尽管制造业这样的竞争行业在面临全球竞争时, 利润微薄, 薪酬水平可能有所降低; 但另外一些竞争行业, 如餐饮业、服务业之类, 其生产率本来就很高, 全球竞争对其影响则不明显。

(四)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制造业

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相互替代性(张军、郭为, 2004)。无论外商是以订单的方式(对外贸易)还是以投资的方式(外商直接投资), 它们均集中于我国的制造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姜茜、李荣林, 2010)。即使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针对零件的加工装配组装行业, 而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机电产品(袁欣, 2010)。

关于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收入的关系, 学者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基于国际贸易理论, 认为对外贸易会提升制造业收入。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对外贸易能更好地利用双方的比较优势, 使贸易双方获利。我国劳动力充裕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现实决定了我国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于我国的制造业仍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所以占主体的非技术工人工资将不断上升, 从而带动整个制造业行业平均收入的增加。顺着这一研究思路, 徐水安(2003)认为, 我国的收入差距会随着入世而降低。魏尚进(Wei 2002)发现, 在城市层面, 对外开放对中低收入者的回报更大, 因而它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对外贸易对技术工人、科技人员、男性的报酬更高, 因而拉大了这些优势群体相对于广大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考虑到我国的制造业技术含量较低、从业人员多为无技能和少技能人员的现实, 可以推断对外贸易对制造业的行业收入具有抑制作用(Feenstra & Hansen, 1997)。

关于中国的研究大多发现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正向关系, 并将此归因为对外贸易对技术工人、科技人员的较高回报。实证研究发现, 对外贸易扩大了技术工人相对于非技术工人(赵莹, 2003)、科技人

员相对于非科技人员(包群、邵敏,2008)、男性相对于女性(刘斌、李磊,2012)、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赵丹、张尧,2013)的收入优势。

以工资水平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则发现,对外贸易的收入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它对近年来制造业行业、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净效应则多为负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对外贸易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吸引内地农民到沿海开放地区打工。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对外贸易普遍提高了员工收入(王绍光,2001)。基于较为晚近的数据分析则发现了相反的模式。包群等学者(2011)基于对1998—2001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工资分析发现,出口并未能显著改善员工收入。另一项基于1998—2008年入户调查的数据分析则显示,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扩大了收入不平等(Han et al.,2012)。

全球化研究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并认为这种竞争压低了制造业员工的收入水平。经济全球化使企业不仅要面临国内竞争对手的竞争,更需面临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国际竞争压力驱动企业尽可能降低劳动力成本,以便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也被称为“探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关信平,2002)。2001年“入世”以来,我国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这对制造业出口施加了更广泛的竞争压力,使控制成本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出口竞争对制造业行业的平均收入会产生抑制作用。

进口同样对行业收入存在负向效应。入世以来,为履行成员国责任,我国大幅度降低了进口产品关税、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进口大量增加。特别是许多贸易壁垒针对的都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汽车、机电等,对我国的相关行业造成了严重冲击,造成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失业(海闻,2001)。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在岗员工薪酬水平下降。

总之,强调比较优势的学者认为对外贸易与制造业行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强调人力资本(技术工人 vs. 非技术工人)、科技创新、市场竞争的学者则多赞同对外贸易抑制了制造业的行业收入。基于学者的不同观点,笔者构造出以下假设。

假设2:对外贸易水平对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2a: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水平越高,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高。

假设 2b: 基于竞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对外贸易水平越高, 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低。

由于学者们对外国资本的性质判断不同, 因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 也存在不同看法。

主流经济学认为, 资本就是资本(*Capital is capital*), 不涉及权力与社会关系, 因此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没有本质区别。外资涌入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 因而提升了制造业的收入水平。一项基于墨西哥1990 - 2000 年的数据分析显示, 外资进入提升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回报(*Jensen & Rosas, 2007*)。外资的作用机制有二: 首先, 外资企业进入带来了大量资本, 降低了本土资本的稀缺性, 进而降低了对资本的收入回报, 提升了对劳动者的收入回报。第二, 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为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为那些缺乏技能、难以找到工作的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现代化理论认可主流经济学对外资性质的判断, 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资本能普遍提升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各行业收入水平, 进而促进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即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结构转型的“阵痛”, 经过产业升级, 它们最终会提升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水平(*Kentor, 2001*)。

与之相对, 多数社会学学者则持相反立场, 认为资本不仅是资本, 资本流入还附带了一定的权力和关系。资本的流入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结构, 对制造业收入有显著抑制作用。针对前述经济学家认为的外资与制造业收入的正相关关系,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区分了外资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指出外资在短期内固然有着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稀缺资源的作用, 但就长期来说, 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东道国的产业结构, 导致东道国工业畸形发展, 仅有外向型工业门类(如采掘业、制造业) 有所发展(*Dixon & Boswell, 1996*)。尽管制造业这样的外向型产业获得一定发展, 但外资的目的是尽量获得利润, 它们没有兴趣扩大投资, 更不愿为东道国税收、公共服务等事项出力。因而, 外资存在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动机(*Curwin & Mahutga, 2014*)。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则强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跨国分工体系(*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labor*), 认为发达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和剥削是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根源。在这一体系中,作为核心国家的发达国家主要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而作为边缘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受剥削地位。随着外国资本不断进入发展中国家开设企业,它们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使发展中国家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Wallerstein, 1974)。外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外向型部门如制造业收入偏低。

尽管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革新,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目前的作用仍是以资本积累为主,我国仍是资本推动(而非技术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李金昌、曾慧, 2009)。

总之,强调资本的经济属性的经济学者多认为外商投资对制造业收入为积极效应,而强调资本的政治和权力属性的社会学家多认为外商投资降低了制造业收入。基于学者对外商投资的不同看法,笔者设定如下假设。

假设 3: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制造业的行业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 3a: 基于现代化理论,FDI 水平越高,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高。

假设 3b: 基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FDI 水平越高,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低。

(五)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业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高利润和高收入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是美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金融业都是收入最高的行业。对于金融业高收入的解释,经济学主要关注市场机制,如金融市场的扩张、国际贸易带来的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多、金融人才稀缺、金融业生产率高(Manova, 2013)。

与之相对,社会学研究则更强调市场背后的权力关系对金融业高收入的影响。市场均衡不是中立的,亦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市场由一组制度构成,市场领域体现了相关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Fligstein, 2001)。从这一认识出发,学者认为金融业的高收入涉及租金的产生

和分配两个过程。租金(rent) 指的是超出完美市场竞争之上的那部分收入(Sorensen ,2000) 。资本家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市场竞争,而是试图通过创造优惠的市场条件、维护垄断地位等逃避竞争的方式来最大化其利润(租金) 。在租金的产生中,随着金融化过程中金融资本家相对于实体资本家的力量不断上升,他们说服国家放弃以往严苛的货币政策,扩大金融业从业范围,进而逐步去除对金融业的管制(deregulation) ,放松对金融投机行为的监管(speculation) ,这些优惠政策使金融业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利润。租金的分配同样是一个社会性的不断谈判的(socially negotiated) 过程(Garruthers & Kim ,2011) 。随着金融部门实力的上升,租金的分配也随之向金融业从业者倾斜,特别是其中的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 、以佣金为收入来源的从业者(commission-based employees) 和银行家(Tomaskovic-Devey & Lin ,2011) 。总之,社会学学者认为,金融业实力的上升促使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其扩张和利益分配的政策,这是金融业高收入的重要根源。

我国金融业的高收入则源于全球化的挑战对国家政策的塑造。金融业在本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及其高风险、高利润的特征共同塑造了国家对金融业的行业政策:在强化金融业垄断地位的同时,利用国家之力帮助金融业偿还债务、提升效率、学习模仿西方金融创新工具。所有这些都造就了金融业的高收入。

与金融业高风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金融业刚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制度刚刚确立,绩效不容乐观。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1999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0%,已经处于“技术性破产”(谢平、尹龙,2002) 。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形成是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金融业只承担银行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是全国惟一的一家银行。^① 各级银行无需面对信贷风险,也无须根据利益导向运作。所有的货币供给由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所有的货币需求由计划经济决定,利率由人民银行总行决定,银行的盈余统统上缴,金融市场完全不存在。总之,银行只是完成计划指令的工具,并不具备自主运作和调节经济的独立性(宋士云,2008) 。从

^① 1955年和1963年曾两度恢复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但存在时间每次都很短,之后又重新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于1949年,1959年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后转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领导,专营少量国外业务,但难以称得上是独立的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业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建立完整的银行、保险、证券这三大金融行业,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金融业的发展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扩张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计风险的粗放式扩张。从 1989 年到 1997 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 4.63 倍,但利润反而下降了 63% (从 242.4 亿元降至 85.1 亿元),而管理成本增长了 8.7 倍。^①

1997 -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 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极大的震动,国家开始正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认识到由于竞争力低下和长期累积的高风险,金融业极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历史上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久,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并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金融业实力的举措。

首先,维持并强化金融业的垄断地位。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央行的地位和职责,建立了四家国有专业银行(即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 12 家由国企或地方政府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②与此同时,提高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并限制业务范围。^③其次,通过利率管制,保障银行业的高利润。在整个金融业中,银行业的利润占 85%,而银行业高达 70% 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利差。中国一直存在着利率管制,^④即存贷款利率由国家规定,银行通过贷款与存款之间的高额利差获得利润。利率管制使利率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使存贷款完全不受市场的约束。与此同时,由于存在准入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存在高度的垄断,工业企业在寻求贷款时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空间,缺乏议价能力,只能被动接受贷款利率。第三,以国家之力,

①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2 - 1998 年)。

② 包括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

③ 外资银行受到地域限制,无法开展人民币业务,无法发放银行卡和存折,理财产品种类也受到限制。尽管在理论上这些限制近几年有所松动,但外资银行无法和国资银行平等竞争仍是事实。

④ 2013 年 7 月,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2015 年 10 月,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管制,这是利率市场化的里程碑。但央行仍控制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存贷款利率仍在相当程度上由国家决定。

帮助银行业偿还贷款。为使银行资产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底线,1999-2005年国家帮助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将其转化为国家债务。2003年和2005年国家先后动用外汇储备600亿美元注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但即使如此,我国仍是世界上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谢平、尹龙,2002;周振海,2007)。第四,推动四大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这不仅帮助四大国有银行募集了大量资金、提高其管理水平,并通过引进外资股权——美洲银行和苏格兰银行——促进银行业更直接、深入、迅速地学习西方银行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这些都提高了银行业的盈利水平。第五,维持汇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在促进金融业盈利的同时降低其风险。由于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国际金融资本借此施压我国,要求我国实现汇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不超过2%,这在本质上仍是固定汇率制。资本账户管制即对跨境交易和资金转移实施管制。这两种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开来,降低了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

可见,强化金融业在垄断行业中的优越地位是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利益有着显著区别:那时候金融业只是个普通行业,而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则一直受到国家的特别扶持;当下金融业除了享受一般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外,还享有各种额外的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提高效率和竞争力。金融业的高收入是垄断地位、高效率、先进技术加上低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我国参与全球经济越深入广泛,潜在的金融风险就越大,金融业就越重要,国家采取的扶持金融业的政策就越能提高金融业的行业收入水平。据此,可以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4: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金融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高。

假设4a:对外贸易水平越高,金融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高。

假设4b:FDI水平越高,金融业的行业平均收入越高。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2000-201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例如,北京市在2014年的数据构成了一条记录(observation)。数据覆盖了中国大

陆全部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缺失值则主要出现在部分省份个别年份的行业劳动力性别和学历方面,具有一定随机性。总之,本数据是对我国大陆 2000—2014 年各省级单位情况的全面反映。

本文使用广义线性回归中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并通过计算集群标准误(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进一步处理组内相关性。通过 hausman 检验,本文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具有单位根(unit root)的变量,本文采用差分的方式确保其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对于可能出现的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将因变量作为滞后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的方法进行控制,将滞后变量作为未被观察到的个体异质性和历史因子的代表。对于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关系,即制造业工资低也可能导致进出口和 FDI 比例更高,本研究通过设置工具变量,确保因果关系的存在。^①同时,由于面板数据中自变量的滞后效应,本文在回归方程中对所有的自变量都采用滞后一年的处理方法(Brady et al., 2005; Haggard & Kaufman, 2008)。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Delta Y_t = \beta_0 + \beta_1 Y_{t-1} + \beta_2 X_{t-1} + \varepsilon_t$$

其中, ΔY_t 是因变量 Y 在年份 t 相对于年份 $t-1$ 的一阶差分, β_0 是截距, Y_{t-1} 是因变量的滞后变量, X_{t-1} 是自变量矩阵的滞后矩阵。

本文使用行业平均工资作为因变量^②测度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包括: (1) 垄断行业平均工资; (2) 竞争行业平均工资; (3) 金融业平均工资; (4) 制造业平均工资; (5) 除金融业外的其他垄断行业平均工资; (6) 除制造业外的其他竞争行业的平均工资。其中,因变量都采用实际工资而非名义工资以便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且取对数值以避免有偏估计。对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界定,参照李骏、顾燕峰(2011)和李路路等(2016)的标准进行。^③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① 本文采用各省级行政单位每年的入境游客人数和入境游客人均花费作为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工具变量,结果依然成立。这两个工具变量通过了 15% 的弱工具变量检验(即可以认为它们是外生的),但 Sargan 检验显示,它们仍与扰动项具有一定相关性。如需这一分析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②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③ 岳希明等(2010)则只考虑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典型的垄断行业,排除了(1)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2)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竞争行业中则增添了农副产品加工业。笔者亦基于岳希明的分类进行了分析,结果依然成立。

产;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竞争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全球化研究一般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百分比和 FDI 占 GDP 百分比来测量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的影响程度(如 Brady et al., 2005)。本文遵照这一传统, 使用这两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衡量经济全球化对垄断行业、竞争行业以及金融业、制造业平均收入的影响。

此外, 控制变量纳入了影响行业收入的以下四方面因素: (1) 经济发展程度。经济越发达, 收入水平越高, 这对各行业来说都是如此。本文用各省的 GDP(取对数) 以及人均 GDP(取对数) 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2) 行业的劳动力特征。一个行业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 则该行业的平均收入越高。本文用该行业从业者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百分比来衡量该行业的教育水平。同时, 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收入优势。本文用该行业男性所占百分比来衡量男性的比例。(3) 行业的重要性。本文用该行业对 GDP 的贡献比例来测量该行业的重要性。如果该行业的贡献越大, 那么行业的平均工资可能越高。(4) 重大事件。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在显著下滑后缓慢提升, 但始终未达到 2006 年的最高水平。本文对比 2008 年之后与之前的年份, 设置 2008 年之后的年份为 1, 此前的年份为 0, 以便控制这一重大事件对行业收入可能导致的影響。

四、发现与分析

分析发现, 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影响了我国的行业收入水平。第一, 对外贸易规模显著降低了整个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进口和出口加剧了竞争, 降低了垄断行业获取“租金”的能力和规模, 进而降低了垄断行业总体的平均收入水平。第二, 对外贸易规模显著提升了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我国的高外贸依存度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国家在推动强化金融业垄断地位的同时,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培育金融业发展的政策, 这些都对金融业平均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 外商直

接投资(FDI)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假设1、3、4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

(一) 经济全球化下的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

首先来看经济全球化对垄断和竞争行业平均收入的影响。表1^①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4、模型5分别报告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它们的影响。模型1、模型2显示,对外贸易对垄断行业整体有负效应,且前者的负效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对外贸易占GDP的百分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垄断行业整体的平均收入水平降低0.03% ($=1 - e^{-0.000278}$)。模型4、模型5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竞争行业的作用并不显著,尽管其系数为负。假设1a得到验证。

可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我国日益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整个垄断行业的收入优势有所降低。至于这种降低趋势是否会持续,则取决于国家是进一步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还是对不同的行业区别对待——例如金融业作为垄断行业的特例在国家高度扶持、重点关照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收入优势。

本文控制了行业GDP贡献、所在省份的GDP及人均GDP水平。其中,该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GDP——在模型1和模型3中都体现显著的正效应,说明行业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是水涨船高的一致性关系。本文还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比较了金融危机之前与之后的行业收入水平。该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体现正向的显著性,表明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2014这六年相对于之前的九年各行业的收入水平都有显著提高,金融危机并未显著破坏行业收入水平。

(二) 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业与制造业

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处境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息息相关。表1的模型3和模型6分别描述了金融业和制造业的行业收入水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模型3显示,对外贸易显著提升了金融业的收入水平。对外贸易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金融业的行业收入上升0.1% ($= e^{0.00122} -$

^① 表1—表3的模型是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并计算了集群标准误(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的结果。笔者亦针对表1分别计算了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结果仍然成立。

1)。与此相反,FDI则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收入水平。FDI占GDP的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制造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则降低2% ($= 1 - e^{-0.0178}$)。总之,全球化进程对金融业和制造业的收入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它在提升金融业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制造业收入。假设3b、4a得到验证。

制造业作为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行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2014年,制造业员工高达5243万人,是金融业员工的10倍,是城镇就业职工总数的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15:115-117)。制造业主要包括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和机械电子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为主要形式。招商引资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外资优惠政策,包括低利率保证、政府信用担保、贷款津贴等金融信贷政策(黄送钦等,2017),这间接加剧了本土资本的市场竞争劣势,促使其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从整体上降低了行业工资水平。关于外商投资后果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本文得到了支持。

金融业的高收入是国家在面临全球化风险时重点扶持该行业的结果。随着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金融资本不再仅为实业进行融资和服务,而是成为独立的力量,利用各国的金融形势和弱点四处出击牟取暴利。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和一定程度的汇率管制,国际金融资本不能随意进出中国。它们转而以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这促使国家大力扶持仍相当弱小的金融业;除了稳固其垄断地位外,还采取减轻债务、改善经营、引进西方金融技术等方式,为金融业贡献了高利润。高利润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行业从业者的高工资。

本文还控制了劳动力的相关特征——男性和大学学历者所占的百分比。高学历和男性均对某些行业的收入产生提升作用。其中,大学学历对金融业的收入提升最为显著。大学学历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模型3中金融业的行业收入则上升3% ($= e^{0.026} - 1$),模型1中垄断行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则上升1.4% ($= e^{0.0136} - 1$)。大学学历对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提升作用则不显著。金融业中的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显著的收入优势,其收入比女性高0.5% ($= e^{0.00506} - 1$)。

基于表1模型1、3、6中经济全球化对相应行业收入的显著效应,本文还考察了这一效应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图3描述了对外

贸易和 FDI 分别滞后 0 - 4 年对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作用规模。^① 柱状图表现了每年的效应,实线则描绘了其累积效应。其中对外贸易对金融业的效应在第四年达到最大,FDI 对制造业的效应则在第一年达到最大。滞后五年及以上时其效应均不再显著。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制造业的作用最为直接迅速,它通过全球市场竞争迅速反映到员工的福利上;与之相反,经济全球化对金融业的作用则较为缓慢。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使其基本上与国际竞争切割,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主要通过国家政策得以反映。它遵循了一个由国际市场—国家—金融业的过程,而国家制定政策需要一段时间,因而其最大效应往往不在当年或次年,而在第四年才得以体现。

表 1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收入(2000 - 2014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垄断行业	其他垄断行业	金融业	竞争行业	其他竞争行业	制造业
滞后变量	-. 338 *** (. 0546)	-. 388 *** (. 0807)	-. 407 *** (. 0768)	-. 450 *** (. 0755)	-. 478 *** (. 0768)	-. 496 *** (. 0626)
行业 GDP 贡献	-. 00354 (. 00451)	. 000189 (. 00347)	. 00394 (. 00685)	-. 00604 (. 00511)	-. 00638 (. 00560)	-. 00207 (. 00450)
对外贸易	-. 000278* (. 000141)	. 0000737 (. 000252)	. 00122 *** (. 000311)	. 000263 (. 000394)	. 000298 (. 000427)	. 000400 (. 000347)
外商直接投资	. 00271 (. 00170)	. 000150 (. 00305)	-. 00120 (. 00296)	-. 00223 (. 00322)	-. 000265 (. 00340)	-. 0178 *** (. 00390)
GDP	-. 0598 (. 0559)	. 0531 (. 0628)	-. 0346 (. 0827)	. 0372 (. 0691)	. 0399 (. 0750)	. 0773 (. 0888)
人均 GDP	. 118 ** (. 0521)	. 0245 (. 0410)	. 0981* (. 0493)	. 0146 (. 0365)	. 0171 (. 0398)	. 00236 (. 0445)
男性比例	. 000452 (. 000804)	. 00161 (. 00215)	. 00506 *** (. 00155)	-. 000425 (. 00252)	-. 000730 (. 00272)	. 00311 (. 00270)
大学比例	. 0136 *** (. 00267)	-. 000811 (. 00132)	. 0260 *** (. 00510)	-. 00159 (. 00111)	-. 00170 (. 00119)	-. 000786 (. 00152)

① 对外贸易对垄断行业的影响仅在滞后一年时显著,故图 3 仅报告了对外贸易和 FDI 对金融业和制造业的效应。

续表 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垄断行业	其他垄断行业	金融业	竞争行业	其他竞争行业	制造业
2008 年以后	.125 *** (.0333)	.176 *** (.0502)	.243 *** (.0551)	.0676 *** (.0237)	.0715 *** (.0255)	.323 *** (.0735)
常数项	1.594 (1.033)	.453 (1.368)	.523 (1.645)	1.311 (1.613)	1.371 (1.746)	.398 (1.976)
R ²	.50	.53	.62	.50	.48	.52
样本量	321	220	321	218	218	220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双侧检验)。(2) 括号内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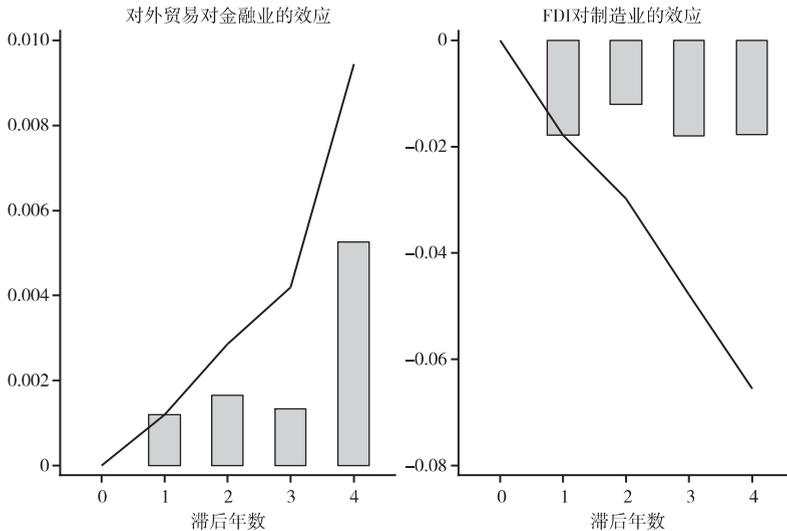


图 3 对外贸易与 FDI 效应的滞后分布(lag distribution)

(三) 经济全球化对东部和西部的效应

我国的市场转型是分阶段、分地区进行的,即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之后中西部内陆地区再向外开放。这一梯度性政策的一个后果是东部地区获得了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正如图 4 描述的那样,2000-2014 年,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占 GDP 的比重平均高达 56% - 83%,西部地区则仅为 8% - 13%。外商直接投资

也体现了一致的模式 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3% - 5% , 是西部的 3 倍 - 5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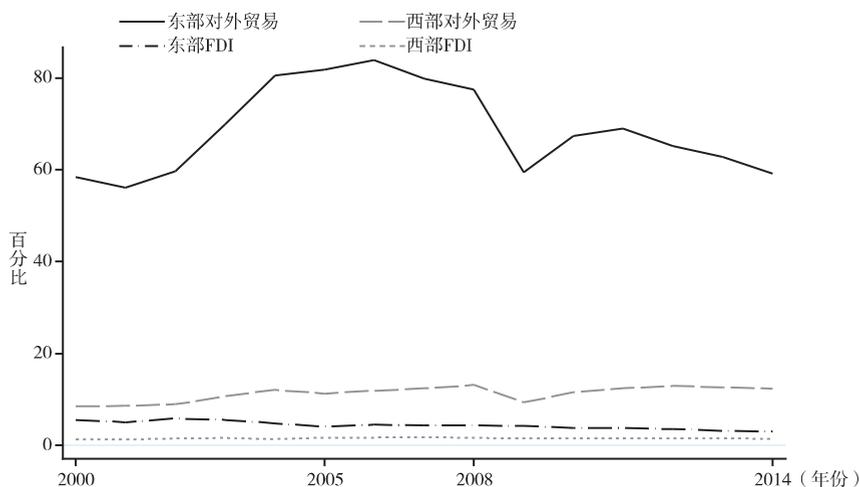


图 4 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全球化水平

本文业已表明 经济全球化显著影响了整个垄断行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平均薪酬水平。那么这一效应是仅存在于高度对外开放的东部 还是亦存在于西部?

表 2 和表 3 将样本拆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子样本 采用同样的回归方法 分别考察了经济全球化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影响。^① 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 前述经济全球化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均同样存在。首先, 对外贸易对东西部的垄断行业收入均有显著的负效应, 即对外贸易每上升一个单位 东西部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模型 7 和模型 13) 分别下降约 0.03% ($= 1 - e^{-0.000299}$) 和 0.04% ($= 1 - e^{-0.0004}$) 。其次, 东西部的竞争行业均未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显著影响。第三, 东西部的制造业均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模型 12 和模型 18) , 其效应规模分别为降低 1.7% ($= 1 - e^{-0.0170}$) 和 2% ($= 1 - e^{-0.0203}$) 。金融业的行业收入则只在东部地区(模型 9) 显著受到对外贸易的促进 ($e^{0.00130} - 1$) ,

^① 按照已有研究的常规(如贾彧、孔繁成, 2015) 本文的东部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河北、海南八个省份外加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 除此之外的省份和直辖市都作为西部地区处理。

在西部,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这也是东西部两个子样本在主要发现上的唯一区别。

表2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收入:东部(2000-2014年)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垄断行业	其他垄断行业	金融业	竞争行业	其他竞争行业	制造业
滞后变量	-.163* (.0753)	-.314* (.145)	-.487** (.211)	-.780*** (.0662)	-.796*** (.0860)	-.464*** (.0883)
行业GDP贡献	-.0103** (.00332)	-.00357 (.00333)	-.00187 (.0139)	-.0186** (.00592)	-.0192** (.00637)	-.0108* (.00587)
对外贸易	-.000299*** (.000110)	.000164 (.000340)	.00130** (.000502)	.000644 (.000422)	.000722 (.000437)	.000222 (.000437)
外商直接投资	-.000878 (.00179)	-.00345 (.00416)	-.00136 (.00272)	-.00142 (.00400)	.000566 (.00431)	-.0170*** (.00242)
GDP	-.0225 (.0588)	.0118 (.0709)	-.0145 (.167)	.219* (.0991)	.234* (.107)	.0797 (.113)
人均GDP	.0256 (.0412)	-.00938 (.0306)	.113 (.0758)	-.0245 (.0311)	-.0308 (.0292)	.00124 (.0461)
男性比例	-.000433 (.00165)	.000846 (.00229)	.00631** (.00241)	.00185 (.00159)	.00203 (.00183)	.00130 (.00188)
大学比例	.00516 (.00584)	.00127 (.00126)	.0287** (.0117)	-.0000440 (.00165)	-.000223 (.00177)	.000417 (.00118)
2008年以后	-.0148 (.0347)	— —	.157* (.0793)	— —	— —	— —
常数项	1.204 (1.307)	1.796 (1.504)	.136 (3.445)	-1.214 (2.578)	-1.486 (2.795)	.649 (2.598)
R ²	.58	.58	.59	.65	.64	.62
样本量	112	79	112	79	79	79

注:(1)* p < 0.1, ** p < 0.05, *** p < 0.01(双侧检验)。(2)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3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收入:西部(2000-2014年)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垄断行业	其他垄断行业	金融业	竞争行业	其他竞争行业	制造业
滞后变量	-.389*** (.0589)	-.404*** (.0937)	-.363*** (.0610)	-.395*** (.0955)	-.427*** (.102)	-.530*** (.0943)

续表 3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垄断行业	其他垄断行业	金融业	竞争行业	其他竞争行业	制造业
行业 GDP 贡献	.00282 (.00518)	.00269 (.00708)	.00880 (.00771)	-.00158 (.00859)	-.00141 (.00964)	.00344 (.00735)
对外贸易	-.0004* (.00019)	-.000873 (.000948)	-.00103 (.00161)	-.000561 (.00206)	-.000815 (.00227)	.00148 (.00177)
外商直接投资	.00186 (.00185)	.000595 (.00623)	.000997 (.00296)	-.00739 (.00694)	-.00539 (.00743)	-.0203** (.00771)
GDP	-.187* (.0981)	-.0922 (.195)	-.195 (.236)	-.0301 (.273)	-.0349 (.309)	.200 (.206)
人均 GDP	.234** (.106)	.181 (.167)	.220 (.213)	.00806 (.257)	.00870 (.289)	-.0887 (.196)
男性比例	.00129 (.000852)	.00258 (.00278)	.00351 (.00204)	.000985 (.00425)	.0000854 (.00470)	.00829** (.00368)
大学比例	.0180*** (.00298)	-.00300 (.00316)	.0268*** (.00606)	-.00297 (.00309)	-.00278 (.00342)	-.00462 (.00278)
2008 年以后	.157*** (.0378)	.205** (.0727)	.254*** (.0662)	.351** (.133)	.378** (.143)	.299*** (.103)
常数项	3.797** (1.726)	2.865 (3.949)	3.416 (4.238)	2.793 (5.041)	3.116 (5.692)	-2.123 (3.858)
R ²	.54	.56	.70	.50	.48	.56
N	209	141	209	139	139	141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双侧检验)。(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东西部在对外开放效应上的一致性既表明本文研究发现的稳健性,也说明东西部的行业处于相似的制度环境,决定行业收入的制度设置基本一致。尽管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的水平上逊于东部,其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其金融业受到高度扶持的情形则是同样的,所以无论该行业是处于东部还是西部,经济全球化对其行业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五、结 论

垄断—竞争的行业分割视角难以解释为何垄断行业中金融业收入

最高,而竞争行业中制造业收入偏低。本研究指出,理解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基于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降低了制造业的行业收入(假设3),提升了金融业的行业收入(假设4)。同时,经济全球化还显著降低了整个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但它对竞争行业整体收入水平则没有显著作用(假设1)。总之,假设1、3、4均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

本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结构,它通过国家的行业政策起作用。首先,基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我国首先在制造业实现了对外开放。制造业面临的全球竞争对行业平均收入有抑制影响。其次,基于我国金融业水平薄弱、国际金融风险高企的现实,我国对金融业采取了高度保护的措施,这与制造业的全面开放恰恰相反。在强化金融业垄断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行业高收入。第三,尽管国家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重点行业,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范围的扩大仍对垄断行业的收入产生了一定抑制影响。

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学者多从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如行业垄断)着眼,认为二者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收入不平等的产生机制(陈光金,2010)。本研究亦表明了这一点:全球市场这一市场机制的后果取决于国家制定的行业政策和相应的制度设置,非市场机制构成了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

本研究试图对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平等这一问题给予系统分析,这在既有的社会学研究中尚不多见。主流经济学文献多将经济全球化视为一个市场过程,讨论其如何影响生产率、技术革新、企业利润(王蓓蓓,2016;叶娇、王佳林,2014)。然而这一视角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同时还是个社会和政治过程,它往往通过国家政策发挥作用(Alderson & Nielsen 2002; Bandelj, 2009)。本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对行业收入的影响与国家形塑市场的方式密切相关。换言之,国家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在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时,有必要将国家的角色考虑在内,而不能仅仅考察市场的作用。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受到数据的局限,在分析行业收入时,难以充分考虑行业内部的差异。例如,未能区分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党员和非党员身份对收入的影响。在考虑外资的影响时,也未能区分港澳台地区资本与其他外国资本。这一遗憾有待于更多数据资料的积

累来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 包群、邵敏 2008,《外商投资与东道国工资差异:基于我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5期。
- 包群、邵敏、侯维忠 2011,《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经济研究》第9期。
- 陈光金 2010,《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关信平 2002,《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社会福利》第1期。
- 姜茜、李荣林 2010,《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经济问题》第5期。
- 海闻 2001,《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领导决策信息》第20期。
- 郝大海、李路路 2006,《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黄送钦、吴利华、吴成颂 2017,《FDI竞争具有债务融资“挤出效应”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 贾彧、孔繁成 2015,《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与FDI——基于我国东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6期。
- 李金昌、曾慧 2009,《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统计研究》第3期。
- 李骏、顾燕峰 2011,《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路路、朱斌、王煜 2016,《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作组织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刘斌、李磊 2012,《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经济学(季刊)》第2期。
- 罗楚亮、李实 2007,《人力资本、行业特征与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 齐亚强、梁童心 2016,《地区差异还是行业差异?——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宋士云 2008,《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0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王蓓蓓 2016,《FDI所有权结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商业经济研究》第22期。
- 王绍光 2001,《开放与不平等——中国能否补偿加入WTO的受损者》,《管理世界》第6期。
- 王水雄 2014,《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层级性与边界性——着眼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一项探讨》,《社会学评论》第2期。
- 王天夫、崔晓雄 2010,《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王亚柯、罗楚亮 2012,《经济转轨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 吴愈晓 2011,《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谢平、尹龙 2002,《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研究》,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三期课题报告。

- 徐水安 2003,《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收入分配的演变》,《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 杨典 2018,《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性”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社会》第2期。
- 叶娇、王佳林 2014,《FDI对本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
- 袁欣 2010,《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经济学家》第6期。
- 岳希明、李实、史泰丽 2010,《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张军、郭为 2004,《外商为什么不以订单而以FDI的方式进入中国》,《财贸经济》第1期。
- 张展新 2004,《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赵丹、张尧 2013,《对外贸易、FDI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生产力研究》第3期。
- 赵莹 2003,《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 周振海 2007,《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201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Alderson, A. S. & F. Nielse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U-Turn: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5).
- Bandelj, N. 2009, “The Global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The Cas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1).
- Bian, Y. & J.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 Brady, D., M. Seeleib-Kaiser & J. Beckfield 2005,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1975–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6).
- Curwin, K. D., & M. C. Mahutga 201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92(3).
- Dixon, W. J., & T. Boswell 1996, “Dependency, Disarticulation, and Denominator Effects: Another Look at Foreign Capital Pene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2).
- Feenstra, R. C. & G. H. Hansen 1997,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 S., 1972–1990”. NBER Working Paper No. 6052.
- Fligstein, N.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rruthers, B. G. & J. Kim 2011,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3).
- Haggard, S. & R. Kaufman 2008,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Welfare States: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n, J., R. Liu & J. Zhang 2012,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
- Jensen, N. M., & G. Rosas 200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Mexico, 199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3).
- Kentor, J. 2001, “The Long Term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blems* 48(4).
- Lim, A. & K. Tsutsui 2012, “Globalization and Commit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oss-National Analyses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Economy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 Review* 77(1) .
- Lin ,K. & D. Tomaskovic-Devey 2013, “Financialization and U. S. Income Inequality , 1970 – 2008.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5) .
- Manova , K. 2013, “Credit Constraints , Heterogenous Firms ,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
- Nee ,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 .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
- Rona-Tas ,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
- Sorensen , A. B. 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
- Tomaskovic-Devey , D. & K. Lin 2011, “Income Dynamics , Economic Rents ,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 S. Econom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4) .
- Wallerstein , I. M. 1974 , *The Modern World-System , Vol.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 Wei , S. 2002,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fferential. ” 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Xie , Y. & E.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闻 翔

Global Market and Income Gaps between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Finan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Xue* 191

Abstract: The income gap among industries in China is usually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cannot explain why the finance industry within the monopoly industries receives the highest average income, whil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i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receives much lower inco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way how China ha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posed to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takes strategies to liberalize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le highly protect its finance industry.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average income between the monopoly and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at between finance and manufacturing. The panel data analyses spanning from 2000 – 2014 show that the bigger size of foreign trade, the higher average income of the finance industry, and the lower income of the whole monopoly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FDI reduces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manufacturing.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understanding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industries in China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us advances the literature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Reproducing Men: The Traditional Postpartum Ritual and Its Social Meaning *Li Jie* 216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stpartum ritual, newborn baby was not accepted as family member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through the four ritual periods of the “isolation”, “purific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incorporation”, which separated newborn baby from the supernatural world, passed it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Mother of Nature”, and finally incorporated it to this world’s human society. “The Rites of Passage” after childbirth made human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process have mor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and realized the real re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whol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is research is also inspiring to nowadays postpartum care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in the background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zation.